

苏联剧变研究

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和历史原因

1991 年 8 月中旬以来，苏联国内政局发生急剧变化。1991 年 8 月 19 日的事变是一个转折点，这次事变遭到失败更加快了苏联各方面演变的进程。事变失败以后，右翼势力在戈尔巴乔夫配合下，不顾苏联宪法和有关法律，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全面夺取政权。在短短的时间里，苏联面目全非。总的形势是，执政 70 多年的苏联共产党被停止活动，已处于解体状态；苏联政权已被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篡夺；原来的苏维埃联盟已最终瓦解。这是苏联 70 多年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变化，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最严重的挫折。

为什么苏联局势发生这种急剧变化？为什么执政 70 多年的苏联共产党一下子落到这种地步？原因何在？

苏联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在这种变化中自然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影响，但这些还只是外因，不是主要的，国内原因才是主要的。

国内原因可分两个层次来谈。

第一个层次，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问题上的几大错误，这可说是造成苏联剧变的直接的、近期的原因。就是说，戈尔巴乔夫

发起的所谓改革，从理论到政策，是背离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正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导致苏联社会在思想、政治、经济、民族各领域发生深刻危机，导致苏共的性质、作用和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日益得势，导致联盟的解体。

第二个层次是苏联历史上的原因。这就是说，苏联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理论、政治、经济、民族、党建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问题，出现了不少矛盾。由于长期不进行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积累得愈来愈多。如果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路子是对头的，那么，这些矛盾和问题本来可以得到缓解，可以逐步得到解决。但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方针是错误的，背离了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错误方针推动下，苏联历史上积累已久的问题和矛盾就突出暴露出来，甚至爆发出来，更为严重化，更为尖锐化，形成后来的全面危机，严重动荡局面，反共反社会主义右翼势力趁势夺取权力，苏共的解体和联盟的瓦解，也就不可避免。

一、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新政治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 1987 年末和 1988 年中先后提出的。这些思想的提出，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指导思想的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在这以前，比如在苏共二十七大，谈国际形势还要突出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谈改革还只是改进和完善过去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那么，在提出这些理论论点以后，在国际上，则强调要排除两大体系的对抗性，“从对抗转向合作”；在国内，不

再是完善原有的社会制度，而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要进行“更新”和“根本改造”，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所谓“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苏联内外出现了一系列消极变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翼势力日益猖狂得势，苏共日益陷于困境，苏联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陷于全面危机。这些实际上都同新政治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宣扬和贯彻有着密切关系。

新政治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背离马列主义的实质，是把全人类利益同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全人类的利益、全社会的利益，否认当前在苏联国内外实际存在着的阶级斗争。

戈尔巴乔夫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高于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其根据是，出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人类共同利益是挽救人类免于毁灭。新政治思维理论的宣传者、阐发者扎格拉金（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甚至说：苏联的新思维“已开始变成全世界的新思维了”“因此，对外方针从过去以阶级利益为主，转为现在以全世界人类利益为主”，而且设想：“各国的安全保障将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取决于在履行国际事务中法的、全人类道德的主要作用，而不是各方之间军事潜力对比。”^①

苏联领导根据新政治思维理论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外交行动，在争取为苏联改革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方面，在改革初期得到些成就。如苏美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与整个西欧关系也得到缓和，西欧国家已开始为苏联提供一些资金、技术援助；苏美间军备竞赛势头得到控制，采取了某些实际裁军步骤；同中国实现了

^① [苏]瓦·扎格拉金：《纵然荆棘丛生，也要奋勇前进》，载《国际生活》杂志 1988 年第 8 期

关系正常化；同日本关系得到改进；苏联军队完全撤离阿富汗，等等。但是，由于理论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又急于短期见效，戈尔巴乔夫在同西方对手进行“对话”、“磋商”中，常常出现退让、迁就和自保，因而在取得某些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消极后果。如苏联领导人由于过分热心追求苏美合作和同西欧的合作，导致处理任何事情，包括处理国内政治、经济、民族问题，都要考虑西方的反应，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内政干涉和施加压力，都缺乏有力表示；再如，由于担心西方反对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思想，对东欧局势的变化和执政党困难处境，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旁观态度，以致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很快被颠覆，东西德以苏联自己不愿看到的方式实现了统一；再如，从主观愿望出发，过早宣布放弃集团政策，导致华约崩溃和经互会瓦解。其结果是，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作用大大削弱，在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活动中，苏联实际已降到美国的小伙伴地位。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对外关系的这些消极后果来看，所谓“新思维开始成为全世界的思维”，“各国安全保障取决于全人类道德的主要作用”云云，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没有从客观的阶级利益分析出发，就只能变成毫无根据的空想。至于苏联改革初期在外交方面同西方国家关系取得的某些“成就”，毋宁说更多地是西方国家从本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的结果。至于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从阿富汗撤军等，这是好事，但这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对外关系原则所应采取的政策，很难算到“新政治思维”的账上。

那么，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究竟要搞什么？看一看他最近的言论和几年来实践的发展，就可以得到答案。戈尔巴乔夫在 1991 年 4 月中央全会上反对有些人主张对反

社会主义势力采取强硬措施，他强调“要以民主方式走向我们社会的人道化”，“应该把社会利益无条件地置于狭隘的党派利益之上”，“不是以对抗为基础，而是以和解为基础达到这一目的”。而且强调，“只有我们这样行动时，我们才有道义上的权利去要求所有别的人这样做”。这几段话清楚不过地勾划出戈主张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如果再看看这几年为走向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实际措施，这个理论把苏联引向何方，就更为清楚了。这些措施主要是，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在苏共纲领性声明中提出“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苏共放弃“垄断主义”，起议会党的作用；“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等等。由于戈尔巴乔夫无视苏联社会仍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个最重要的实际，这些言论和行动，不但没有导致在苏联出现戈所设想的什么社会主义，而且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按照苏联目前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嚣张活动情况，显然那里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力图把苏联社会引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势力。由于戈尔巴乔夫理论上的错误，他否认阶级斗争，鼓吹全社会利益“无条件地”高于党派利益，鼓吹“以和解为基础”，“用民主方式”来达到目的，而且幻想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也会采取相应的“民主方式”来回报苏共的行动。然而，实际的发展完全与戈的期望相反。戈的否认阶级斗争，片面宣扬“和解”的论点，他的超阶级的民主化、公开性、人道主义化的论点，以及苏共退出执政党地位、放弃垄断等的实际行动，恰恰迎合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需要，正好为那些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利用。他们有恃无恐，反共反社会主义组织纷纷涌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活动更为猖狂。这不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民族矛盾冲突加剧，联盟逐步解体，社会动

荡，经济混乱，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作为执政党的苏共陷于分裂和瓦解，在许多共和国和城市，反社会主义的右翼势力趁机上台夺权，更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了。戈尔巴乔夫以鼓吹新思维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开始，最后以苏联社会主义成果完全丧失告终。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客观逻辑。

第二，进一步全面否定斯大林，造成严重后果。

苏联理论界和报刊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号召下，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马列主义，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反共反社会主义论调十分嚣张，造成严重后果。

批斯大林是戈尔巴乔夫带头发起并逐步加码的。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开始明确提出批判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在1月全会报告中，批判了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及其根源，认为苏联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很大程度上停留在30~40年代水平上，即斯大林时期。“这一时期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被绝对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并被奉为教条”，还认为一系列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理论观念，在这一时期被简单化或被歪曲，由此产生了实际工作中种种不良影响。这些问题无疑是存在的，指出来也是需要的，问题是任凭批判自发发展，实际上导向了错误方向。

到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宣传界领导人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历史和文章中不应有被遗忘的名字和空白点，“应该让所有的东西各就各位”。戈笼统提出“历史上不留空白点”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历史问题常常是很复杂的，有些问题宜粗不宜细，绝不应让人们去纠缠历史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特别是抓住某些带有煽惑性的题目大做文章。这样做，实际上是进一步往错误导向方面推动批判斯大林运动的发展。从1983年起，对斯大林的批判更进了一步。在1988年6

月召开的苏共党的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批评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管理方法对苏联“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他强调“现在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体制”。此后，对斯大林各种批评更为广泛展开，对斯大林模式及其根源的评论大为增多。不少文章完全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有些甚至强辞夺理，并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对斯大林评价的片面否定倾向，越来越厉害了。

戈尔巴乔夫作为领导人，在开始时期，如在十月革命 70 周年报告中，还讲“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应该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有无可怀疑的贡献”。但在两年之后，在 1989 年 11 月 26 日他发表于《真理报》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文章中，就谴责起“斯大林主义”来了，他称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为“专制的官僚主义制度”，“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并且认为，赫鲁晓夫时期反斯大林反的还不够，认为赫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主要问题是保留了这个官僚主义制度。这就是以主要领导人身份出面，不但从理论思想方面而且从体制方面来全面否定斯大林了。

在全面否定斯大林方面，戈尔巴乔夫时期远远超过赫鲁晓夫时期。这不但表现在批判的范围远比赫时期广泛，批判斯大林的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共运各个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批评不只限于揭露一些事实，不只限于批评斯大林破坏法制及其个人品质如何，而且更着重于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并加以全面否定。甚至历来在评论斯大林时加以肯定的东西，这一次也否定了。例如斯大林时期工业化问题，历来都是肯定的。而这次却有不少“吹毛求疵”的否定评论。如有人认为，不搞斯大林时期的加速工业化，而是按新经济政策平稳地发展下去，也可以生产出卫国战

争所需的钢铁，因为卫国战争不是靠 1800 万吨钢（1940 年苏联钢产量），而是靠这个数字的一半打赢的，另一半在战争头几个月就损失殆尽了。也有人认为，加速工业化“为专制制度的发展，用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取代民主集中制创造了条件”。还有人认为，“建立强大工业基础”，是靠“牺牲了人的资源来实现的”，“实现的手段则是社会主义以前的，也就是半封建的手段”。

主张全面否定的论调中，苏学者 A. 布坚科见解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第一，斯大林不是马列主义者，虽然宣称忠于列宁主义，实际离列宁主义愈来愈远。很多方面修正了马列主义。他认为，斯大林除去在反托洛茨基斗争和论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两件正确事情以外，其他都与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连对外政策也不能说是真正列宁主义的。第二，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倒退过程”，认为 20~30 年代之交是个分界线，那时期的国家行政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一步步代替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 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这一社会主义倒退过程表现得很充分。第三，斯大林代表官僚势力篡夺了国家政权。按照这种观点，斯大林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又是一种社会的倒退，这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调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是远远超过了。

进一步全面否定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是思想混乱。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怀疑马克思和列宁，怀疑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以至怀疑十月革命道路，出现信仰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斯大林“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导致对斯大林领导的几十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导致对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来源的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有的人追溯到列宁和马克思，从中找出产生斯大林错误的根据。如一位哲学博士写文章证明大量灾难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

尤其是阶级原理，斯大林不过继承了这个原理。另一位作者则发表文章，攻击列宁为斯大林建立起中央集权警察国家和导致数百万苏联人死亡的全国政治恐怖运动铺平了道路。正如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90 年第 4 期社论指出的：“从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现象的激烈批评变成批判性的分析，后来更变成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的攻击，变成对 72 年中所做的一切的全盘否定。”

其次是，各种思潮乘机而起，出现了大批非正式组织。在“公开性”、“民主化”口号下，过去长期以来，苏联被掩盖着的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民族关系领域，都一下子迸发出来。一些非正式组织在批判斯大林和批判“专制社会主义”旗号下，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苏联共产党。一些民族主义组织，则利用对斯大林的批判，煽动民族仇恨，把民族关系的某些矛盾引向公开对抗。

最后是，出现了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逆流。例如，1990 年 2 月苏联 20 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群众喊出了“苏共中央下台”、“政治局下台，打倒共产党人垄断政权”的反共口号，提出“不要社会主义”，指责苏联“走了 70 年的死路”，出现“马列主义听够了”、“永别了，共产主义！”等反动口号。

虽然苏联目前复杂局势是多种原因形成的，但是，由于批判斯大林问题的片面性而引起的思想混乱，社会主义威信降低、党的威信降低，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错误。

主要错误有以下几点：

（一）对原有体制采取了错误的全面否定的方针。这从戈尔巴乔夫对原有体制提法可以看出来。如称现有各级领导干部里“不断繁衍”的是“各级官僚阶层”，称之为“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

令制度”或“专制的官僚主义制度”、“官僚专制制度”，对这种体制，戈宣称要“打碎”旧的体制，旧的一切“应当予以炸毁”。

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这种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原来的党政机构毕竟是经历多年实践的产物。有些领导人，过去在这种机构中的确犯过不少错误，也有一些人应该在改革中撤换下来，但总的说，只能逐步进行改革。至于“各级官僚阶层”的提法，也是片面的。原有干部，在原来体制下，还是做了工作的，不能笼统地叫做“官僚阶层”，一概成为革命对象。那里有许多愿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干部，尽管机构中有些人思想觉悟不高，但主要应该是争取转变的对象。同时，这个提法也不策略，实际上是“打击一大片”。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后果总是不好的。戈尔巴乔夫后来在许多讲话中，动辄指责各级党政领导人是“阻力”，使各级党政领导人威信降低，难以工作，而且实际上助长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声势。

（二）对反共反社会主义非官方组织和党派采取纵容态度。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进改革，打破改革的阻碍，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口号，但是，缺乏阶级分析，缺乏引导，而且对一些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一再退让，以致不少非官方组织、全国性政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气焰十分嚣张。

近年来苏联成立的非正式组织有 6 万多个，全国性政党有 20 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 500 多个，这些党派大多声明反共反社会主义：“俄罗斯民主论坛”扬言要“把苏共赶出政治舞台”，“没收苏共财产”；“乌克兰共和党”声称要“取缔当地共产党”；“俄罗斯民主党”对列宁采取否定态度，不赞成苏共的奋斗目标；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共产党和“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党”都提出恢复本共和国主权，实现本民族独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对新成立的各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最多只在报纸上进

行一些批驳，对少数非正式组织中的破坏分子，苏领导也说要进行“坚决反击”，但实际上反击并不得力。在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行动纲领中写明：“在法制国家中排除任何阶级政党……的独裁专政。”戈尔巴乔夫本人强调：“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认为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

（三）妥协退让的后果是共产党丧失政权。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他们的策略是通过合法斗争，由地方到中央，步步紧逼，迫使共产党交权。而共产党在民主化过程中，由于过去习惯于发号施令，对突如其来的选举运动，缺乏准备。在 1989 年 3 月的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中，全国 1/3 的原市长落选；参加人民代表竞选的有 20% 党员落选。

在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积极开展竞选，使共产党人落选，取得议会多数，夺取了政权。在俄罗斯联邦，1990 年 5 月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并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 年 6 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一些共和国政权也落入反对派之手。“八·一九”事件之前，在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苏共已在 7 个共和国和莫斯科、列宁格勒及一些城市中成为在野党。

第四，民族关系问题上的错误。

改革以来，苏联民族关系日益紧张，民族冲突和动乱不断扩大，这同戈尔巴乔夫几年来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有密切关系。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曾乐观地认为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问题。在处理共和国事务时，对民族因素也考虑得不够。1986 年撤换哈萨克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职务，委派俄罗斯人接替，由于考虑不周，闹得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对民族地区的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阵线”，开始时只看到他们支持改革的一面，采取怂恿的态

度，而忽视了他们谋求分立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口号的推行，为民族问题的总爆发提供了条件和刺激。波罗的海三国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就是打着支持拥护改革的旗号起事的。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民族骚乱中，许多人举着标语牌写着“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多党制”，都为各共和国民族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鼓励作用。而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护改革与民主化的旗帜，在民族分立主义势力进攻面前，步步退让，客观上又助长了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和发展。

苏目前民族矛盾和冲突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性质之严重，在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据不完全统计，1989~1990年有较大反响的民族冲突流血事件达几十次之多。除土库曼外，其他 14 个加盟共和国都相继出现较大的民族骚乱，有的甚至有“内战”性质。近两年中，因民族动乱而死亡的达数千人，伤近万人，另有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当局曾采取了各种手段来缓解民族问题的危机，但收效很小。民族矛盾冲突的发展，使得各方面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在没有任何团结、凝聚的力量（以前靠党组织、靠对马列主义的共同信仰）情况下，它的发展前景，只能是各家独立，使联盟解体。

第五，“革新”党的错误路线，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发生根本变化。

戈尔巴乔夫为了实现他所设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对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根本性改革”，通过这些改革，苏共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

戈尔巴乔夫为了实现他所设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

目标，对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根本性改革”，通过这些改革，苏共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苏共成为缺乏明确目标，思想混乱，组织散漫，完全丧失战斗力，近似社会民主党类型的党。苏共这种思想上组织上的混乱和涣散状况，在“八·一九”事件前，已经预示出苏共终于将被瓦解的前景。

党的性质、作用的根本变化，首先表现为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不单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过去党纲和党章都明确规定苏共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党，党的全部活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二十八大的党章则改为“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这里，不直截了当地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指导，而是讲什么“创造性发展”，就为不遵循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开了路，而“利用进步思想成果”，又为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混进来充当指导思想开了门。后来的发展，其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倾向更明显了。在 1991 年 7 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提出：“我们在恢复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的起始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同时，也把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的全部财富纳入我们的思想宝库中。”在全会讨论苏共新党纲草案时，戈尔巴乔夫讲得更为明确：“苏共应把本国及世界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全部财富，而不单是马列主义做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党的性质、作用的根本变化之二，表现在党的奋斗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起来。本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很明确清楚的目标，现在则改为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人自由发展”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苏共二十大党章）。或者“苏共是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的党”（党的纲领性声明），而新党纲草案则把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提法都删掉了。虽仍提“忠于社会主义理想”，却一再强

调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说明所指的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虽然也说“没有理由放弃共产主义思想”，但戈尔巴乔夫在全会报告中却强调共产主义是不现实的，认为“我们的经验，而且不仅我们的经验，没有提供认为这一目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成为现实的理由”。

党的性质、作用的根本变化之三是，共产党不再成为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1977年的苏联宪法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则认为，苏共地位不能用宪法条文“强加于人”。1990年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6条。修改后的苏联宪法规定：“苏共、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被选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及其他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种规定，加上1988年6月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精神早就实行的党政职能分开，党不再向行政部门指示工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联的权力中心由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苏维埃和新设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总统委员会，苏共就完全失去了对国家和政府的实际领导权。

党的性质、作用根本变化表现之四，是取消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二十八大经过激烈争论，在党章中，虽然勉强保留了“民主集中制”的字眼，但加上不少限制，实际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如“苏共在思想一致和党的同志式关系以及保证党内生活自我管理、党的利益同个别共产党员利益相结合、普通党员权利和自觉纪律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生活和活动”，其核心思想就是不要对党员个人限制过多。因此，虽保留了这几个字眼，但党章又允许在制定决议时，少数人有权在各种会议上，在党的舆论工具上，捍卫自己的立场；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已无效，因

党章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是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中央不赞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可以“有权不执行这一决议”；党章第 2 章第 7 节又规定：“所有苏共组织，从基层组织开始”，“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因之，民主集中制只是形式上保留，但实质已变。苏共新党纲草案，根本不提民主集中制，连这种形式上的保留也没有了。这种情况，为党内争论不休、反党活动以及分裂活动开了方便之门。苏共党内原已派别林立，这些规定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到“八·一九”事件前，党已不能有什么战斗力了。

第六，经济改革不断出现错误，人民未能从改革中得到实惠。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对经济要进行“激进改革”，在 1988 年中以前，其目标还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 1988 年 6 月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后，指导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也相应出现了向着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变化。但不论前一时期或后一时期，在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上，都暴露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那种急于求成，情况了解差，严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

（一）“加速战略”使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为畸形，加剧了市场紧张。

1985 年 4 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1986 年 3 月苏共二十七大肯定这一方针，并作出具体规划。规定在 1986~2000 年 15 年中，在生产转向集约化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使国民收入翻一番，年均增长为 4.7%。这个方针是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而提出的。但这个方针忽略了苏联长期以来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占工业生产总值 75%，消费品生产只占 25% 的情况；也